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 893 份调查问卷数据

王刘飞,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 893 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 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 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 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 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农民工; 身份意识; 社会互动; 代际差异;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4)06-0070-05

Migrant workers' self-identific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and 893 investigation data

WANG Liu-fei, WANG Yi-j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893 questionnaires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ir identity awarenes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identity aware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ends to be vague. There are such factors tha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ir identity awareness a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with city dwellers includ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distance, and perception of the systems' importance, while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objective economic status are not so significant.

Key word: migrant worker; self-identific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factor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6 亿人^①。农民工的融入状况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有序推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 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方面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2]。

社会融入在个体心理层面的重要体现便是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即个体在社会“场域”中对自身位置的一种感知。它是衡量个体融入主体社会

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3-6], 也是最终实现社会融入最关键的一环, 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7]。关于这种认同的产生主要有三种理论解读: 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8]。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源自天赋以及原生性的情感纽带, 但因其过度强调了原生维度, 忽视了灵活性和情境性, 而被认为是一种静止的族群观, 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工具论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 认为个人会对情境做出策略性反应。这虽然强调了认同的灵活性但是更多地赋予了“理性人”的意涵, 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建构论认为认同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种结构性对抗, 其存在并非基于两者的客观差异而是不同背景的行动者赋予了不同意义的行为差异或文化差异, 但彼此间互动会降低双方差异而趋于规则和价值观的同一。相较前两种理论而言, 建构论既强调了结构性

收稿日期: 2014 - 11 - 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社攻关项目(13JZD02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SH015);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SHB006)

作者简介: 王刘飞(1989—), 女, 安徽岳西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

的制约,也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这对于理解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感情归属、未来归属等方面的主观态度,其中,自我身份认知,即身份意识,是身份认同的首要的核心的要素。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处于模糊状态,并没有某一种身份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城乡社会空间以及群体记忆互动使得农民工对自己身份评价出现模糊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9-10]。这种不确定性是受到制度因素、代际因素、社会交往因素以及城市生活体验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制度性因素尤其是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身份意识的根本性决定要素已成共识,代表性的是刘传江、程建林^[11]的双重“户籍墙”观点,即显性与隐性户籍墙的双重作用固化了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但是,农民工所认为的制度作用并不等同于制度所真正发挥的客观作用^[12],因此有必要探讨农民工是如何看待制度的。在代际差异上,自王春光^[13]提出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以来,众多学者比较了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各种差异,结论与王春光的研究基本一致^[14];但近年来也有调查发现两代人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15-17]。

基于建构论视角以及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农民工身份意识置于“结构制约—互动推动”脉络之中,探讨农民工身份意识的影响因素。首先,由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的长期存在,“农村人—城市人”的差异被赋予了诸多制度性意涵,那么随着农民流入到城市,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制度以及制度性身份,如何定位自己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次,个体与流出地、流入地两类群体的比较,会不会影响农民工的身份意识?最后,身份意识并非是静止不变的,与城市人的交往、互动会不会降低其农村人的身份意识?

二、变量选取与样本特征

2014年春节期间,笔者在流出地进行了农民工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15-55岁跨县/区外出务工、且从事非农活动至少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包括各种类型的自雇和雇主。课题组从江苏省选取两所高校、安徽省选取一所高校,每所学校选择一两个社会学或社会工作专业的班级,由生源地是江

苏、安徽和河南的同学本着自愿原则参与调查。每名同学最多只能调查10位农民工,以保证调查对象的地域覆盖面。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31份,回收有效问卷893份,覆盖3个省的92个县/区。

因变量为农民工身份意识,自变量包括代际差异、经济地位(客观收入、主观地位感知)、社会互动(社会交往、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以及性别、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②。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N=893)

变量	类别及分布
控制变量 性别/%	女 39.3, 男 60.7
受教育年限	均值=9.68年, 标准差=2.43
代际 年龄	均值=27.74岁, 标准差=7.91
经济地位 收入(万元)	均值=4.51, 标准差=2.28
在老家收入位置/%	中上层及以上 14.9; 中层 51.2; 中下层及以下 33.9
在城市收入位置/%	中层及以上 36.0; 中下层 44.6; 下层 19.4
社会互动 本地人在社会交往占的成数	均值=3.40, 标准差 2.96
社会距离	均值=2.09, 标准差=0.48
制度感知 国家政策对个人成功重要性	均值=6.33, 标准差=2.91

身份意识是农民工在户籍制度框架下对“农村人—城里人”序列中自身定位的回答。农民工流入城市,作为漂泊者“在异乡为异客”,存在较强的“旅居”心理,同时由于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以及群体社会记忆的交织使得农民工对自身定位上出现不确定、模糊性。调查发现,农民工感觉自己是“农村人”的占38.3%,感觉“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的占33.1%,感觉“既是农村人也是城里人”的占21.6%,感觉“是城里人”的占7.0%。可以看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更多的是趋于模糊性的认定。这一发现与有关流动儿童的调查结论一致^[18]。

尽管许多农民工在城市居住了很久,有的甚至习惯了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但心理上并不认同自己是个完全的“城里人”。那么,在他们眼中,“一个农村人成为城里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认为是有房子或稳定工作,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有10%左右的认为是有朋友或熟人、乃至通婚,是交往因素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仅有1/3的认为是城市户口

这一制度性因素。也就是说,在农民工看来,拥有城市户口并非是成为“城里人”先决性因素(表2)。这点在成功归因调查中也得到体现。农民工认为,“国家政策(如户口等)”的重要性(均值6.33)要低于家庭及个体层面的因素,仅比“机会和运气”(均值6.00)略高一点(表3)。这或许是“个体化时代”的重要体现^[19]。2013年中国城镇化大规模入户抽样调查数据也显示,目前有2/3的流动人口不愿意放弃原本在农村的户籍^③。可见,城市户口对农民工而言,并不像以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城市就业空间的有限,并不能给每个流动者提供“有稳定班可上”,经济上并非得到完全保障,乃至实现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与农业户口相联的承包土地、宅基地等收益越来越大,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较以前有所提高,客观上给农民工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得农

表2 一个农村人要成为城里人最重要的因素(N=893)

	频数	占比/%
有城市户口(制度性因素)	295	33.3
在城里有房子(经济层面)	240	27.7
在城里有稳定工作(经济层面)	245	27.1
在城里有很多熟人、朋友(交往层面)	83	9.4
与城里人结婚(交往层面)	16	1.8
其他	7	0.7

表3 各因素对于取得成功的重要程度(N=889)

	均值	标准差
国家政策	6.33	2.91
家庭背景和实力	7.18	2.54
个人受教育程度	7.02	2.27
个人努力和能力	7.97	2.01
社会关系	7.41	2.19
机会和运气	6.00	2.58

注:最重要的是10分,最不重要的是1分。

民工缺乏落户城市的动力。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农民工的身份意识。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

为便于实证分析,将“既是农村人也是城里人”宽泛地理解为认同“城里人”身份。同时,参考Simmel、Park关于“边际人”^[20]、Berry关于社会适应的双维度模型^[21]理论,将“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定义为“边缘人”。如此,前述4类农民工身份意识可以合并为3类:“农村人”(38.3%)、“边缘人”(33.1%)和“城里人”(28.6%)。由于因变量是定类变量,采用多项Logis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1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经济地位变量,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纳入社会互动变量,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纳入制度感知变量。表4呈现的是最终模型4。

表4 身份意识的多项Logist回归模型

变量	农村人/城里人		边缘人/城里人		
	B	EXP(B)	B	EXP(B)	
控制变量	性别(女为参照)	0.091	1.095	-0.136	0.873
	年龄	-0.092	0.912	-0.110	0.896
	年龄平方	0.002	1.002	0.002	1.002
	受教育年限	-0.058	0.944	0.013	1.013
经济地位	收入对数	-0.009	0.991	0.327	1.387
	收入在家乡位置(中下层及以下为参照)				
	中上层及以上	-0.894**	0.409	-0.583 !	0.558
	中层	-0.258	0.773	-0.096	0.908
	收入在城市位置(下层为参照)				
	中层及以上	-0.542	0.582	-0.939 !	0.528
社会互动	中下层	-0.342	0.711	-0.198	0.820
	社会交往	-0.171***	0.842	-0.119***	0.888
制度感知	社会距离	0.110**	1.116	0.014	1.014
	制度重要性	-0.030	0.970	-0.071*	0.931
截距		1.628		0.109	
N=827, Nagelkerke R ² =.166, -2likelihood=1.672E3, chi-square=131.407, sig<0.000					

注:P<0.000; P<0.01; P<0.05; P<0.1。

代际差异维度方面,年龄被纳入模型时,通过了显著检验,年龄、年龄平方的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年龄的作用不是线性的,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年龄增加,农民工对城里人身份认同程度先增加,而到一定拐点,认同程度又会降低。但纳入其他变量后,年龄、年龄平方并没有通过检验,这支持了代际差异并不显著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层的组合会形成“代”,“代”的本质在于不同代际的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同代之间共享着大体相似的历史经验^[22]。但是随着社会剧烈变迁和改革层层深入,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强,新生代内部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即使是同代也并非共享着相似的历史经验,内部已经产生很大分化;同时,社会经验也会深深烙在个体身上,它与历史经验共同交织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活以及融入状态,“代”的边界性逐渐变得模糊。因而,代际差异可能为其他层面的差异所取代。

经济地位维度方面,仅收入在家乡和城市的位置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在家乡处于“中上层及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里人”身份的发生比是处于“中下层及以下”的0.409倍;收入在城市处于“中上层及以上”的发生比是“中下层及以下”的0.582倍。农民迈入城市,因城乡空间以及群体记忆,使得参照群体既可能是老家“农村人”,也可能是周边“城里人”,在与这两类群体比较时,如果感觉到经济地位偏低,就会更加感知到周围存在的差异。若这种心态越强烈,就会越趋于认同“农村人”这一身份。

社会互动维度方面,社会交往变量和社会距离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社会交往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交往越频繁,越认同自己是城里人,具体为社会交往每增加一个单位,认同农村人身份的发生比将下降15.8%。社会距离的影响为正向,表明社会距离越大,越认同自己是农村人身份。与城里人交往互动越多,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小,对城里人的身份认可度越高。Timms认为,个体的认同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公共认同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特性决定的^[23]。正是通过与城里人的互动和沟通才改变了他或她的自我感觉。农民工

流入城市,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与城市生活的差异,而与城里人的互动使得农民工能接触到更多的城市生活方式,无形之中消解着他们乡土性的集体意识,在身份认知上增加了城市性元素;同时这种互动也能有效改善农民工人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孤岛化”的现象,减小与城里人的心理距离,进而更加认同“城里人”身份。

制度感知维度方面,认为国家制度(如户籍等)对个人取得成功越重要,那么越趋于认可“城里人”身份。笔者认为,一方面,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将公民分割成不同户籍身份的“城里人”和“农村人”,两类人在经济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存在诸多不平等。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如火如荼,但是现行的制度性身份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仍然有难以逾越的层层鸿沟。另一方面,不可忽视个体在自我身份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身份意识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外因包括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内因包括刻板印象的内化与强化以及提高自尊的动机驱使^[24]。因此在农民工的身份为户籍制度所限定的背景下,个体若认为国家制度很重要,则会持积极的自我认同,去挑战和跨越层层鸿沟,进而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而认为制度并不重要,则会内化制度的限定,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则会受到削弱,造成心理上的“天花板效应”,对城市仅仅是一种“暂居者”心态,进而趋于对“城里人”身份认可度较低。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农民工身份意识处于“模糊化”状态。他们的身份意识既受到主观经济地位、社会互动、对制度重要性的感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行动者自身主体实践能力作用的影响。

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应继续加大力度改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城乡有别的政策体系,赋予农民工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利。当前,城乡分割政策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制度性身份的赋予使得公共资源和服务仍没有实现均等化享有。同时户籍制度层层壁垒也阻碍着社会流动,在与城里人交往

过程中,这种制度性身份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也使农民工会内化这一身份,进而主动放弃融入。

应重视农民工自身的主体实践能力。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的行为不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和自尊这一基本需要决定的,每个人都有获得积极的、正面的“社会认同”的动力,每个人都希望归属于拥有独特的、积极的、正面的认同的群体^[23]。因而,当审视处于不利处境的成员时,应看到他们可能进行的策略性选择,即在与制度、居民等城市社会方方面面交往互动的实践过程中,应关注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以及改善其居住环境,增强其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安居乐业对农民工获得“城里人”身份意识影响重大。经济差异相对来说不仅是外在的也是最被感知到的,因此为更好推进农民工心理层面融入,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职业培训、就业机会、权益保障、住房等方面作出努力,只要这样才能保障农民工在城市有班可上,有房可居,在城市中形成“家”的感觉,认同“城里人”身份,更好地融入城市。

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发挥社区整合资源和促进融入功能。融洽的社区关系不仅能增强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之间的交流,更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弥补远离家乡的乡土情结带来的巨大落差和内心孤寂感,从而提高对“城里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能培养市民平等宽容、相互尊重的核心价值观,提高社会的凝聚力。

注 释:

- ① 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30527_402899251.htm.
- ② 因篇幅所限,文中所使用的变量测量方式没有呈现,若有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 ③ 资料来源于 <http://www.sociologyol.org/shehuiban kuai/shehuipinglunliebiao/2014-04-27/17947.html>.

参考文献:

- [1]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 1996(4): 42-52.
- [2]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
- [3] 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 同化的性质[C]//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 [4]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08(1): 1-23.
- [5] 杨菊华.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0(2): 64-70.
- [6] 王毅杰, 史晓浩.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理论与现实[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97-103.
- [7]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9(1): 17-29.
- [8] 王毅杰, 倪云鸽. 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J]. 苏州大学学报, 2005(2): 49-53.
- [9] 杨菊华, 张莹, 陈志光.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3(3): 43-52.
- [10] 许传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 学术探索, 2007(3): 58-62.
- [11] 刘传江, 程建林. 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 经济学家, 2009(10): 66-72.
- [12] 王毅杰, 王刘飞. 从身份认同看农民工社会融入[J]. 人口与发展, 2014(3): 3-6.
- [13]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63-76.
- [14] 刘传江.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 人口研究, 2010(2): 34-39.
- [15] 李培林, 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 2012(5): 1-24.
- [16] 杨菊华. 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J]. 人口研究, 2010(2): 44-54.
- [17] 张翼. 新生代流动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改变户籍意愿[C]//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8] 史秋霞, 王毅杰. 户籍制度背景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图景[J]. 青年研究, 2009(6): 56-63.
- [19]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 个体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0] 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6): 881-893.
- [21]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 1997(1): 5-68.
- [22] 陈辉, 熊春文. 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基于曼海姆的代的社会学理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51-63.
- [23] Timms, D. W. G. The Urban Mosaic: Towards a Theory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M].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 [24] 王毅杰, 史秋霞.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策略性选择[J]. 社会科学研究, 2010(1): 90-96.

责任编辑: 陈向科